

中国全球化新布局的四大战略重点

张莱楠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格局孕育着重大变化,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全球价值链革命正在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也是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大势。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变化内生于世界经济的结构性变化。未来,中国必须顺应当前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构筑新的全球化战略布局及重点。

第一大战略重点是应该以促进双向投资为重点的新一轮对外开放战略。

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大国与出口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以加工和组装为主导的出口产业会限制中国产品的附加值。在长期看来,随着原材料价格与劳动力成本的继续走高以及来自其他低成本经济体竞争优势的日益加剧,中国在这些领域的比较优势可能会削弱。

目前,全球出口增值的近一半来自服务部门,全球直接投资总存量的60%以上都流向了服务业。这说明,服务要素已成为决定全球价值链利益分配的关键要素,提升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价值链条应该在这方面多花些气力。为此,我们进一步放宽外

商投资准入,推进服务领域的投资自由化,将外商投资项目由核准制改为备案制,将外商投资企业合同章程审批改为备案管理。外资准入大门将进一步打开,将吸引更多的国外高级生产要素,如技术、人力资本等来到中国。同时,2013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达到901.7亿美元,同比增长16.8%,成为流出量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境外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使我国在国际产业转移中角色发生了变化,由单纯的产业转移承接国逐步转向资本双向流动的国家,进入了一个对外投资的新阶段。从长远来看,凡是具有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和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强的新兴产业如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节能环保、生物医药等均有较高的机会参与国际市场的政府采购。因此,全球化红利并没有减少甚至消失,只要中国善于利用吸收全球创新资源和高级生产要素,不断地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攀升,它依然能够给中国带来新一轮红利。

第二大战略重点应是以构筑全球自由贸易网络为重点的自贸战略。

目前,中国已与东盟、巴基斯坦、智利、新加坡、新西兰、秘鲁、哥斯达黎加、冰岛、瑞士等国家和地区,以及港澳台地区签订了12个自由贸易协定,贸易

总额超过了中国进出口总额的1/4,对已建交最不发达国家近5000个税目商品实施进口零关税,并正与韩国、澳大利亚、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挪威、南部非洲关税同盟等进行区域贸易协定谈判。

自贸战略还由国际延伸到国内,中国以建立上海自贸区为切入点,积极推动国内贸易、投资、金融体制在更高水平上与国际规则接轨。建设面向国际市场的若干个金融创新框架与平台,参与制定符合国际化、法治化、公平化要求的跨境投资、贸易规则新体系,将为助推中国经济新一轮的长期增长铺平道路。

第三大战略重点应是以结构调整和升级为重点的全球价值链战略。

全球价值链把世界各国的经济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创造出巨大的物流、贸易流和资金流。一个国家如果游离在价值链之外,势必丧失发展的良机。据统计,世界货物出口量平均增长速度,1913年至1938年仅为0.7%,1948年至1990年为6%以上,1990年至1997年为6.7%;世界出口值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比重,20世纪50年代初仅为5%,70年代初为10%,90年代初达到15%,1995年升至20%。1980年至2011年世界货物贸易额平均增长7%,达到18万亿美元,全球价值链对国际生产、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让全球市场依存度日益加深。未来,应该进一步构建包括跨境的生产和贸易供应链、跨境的金融供应链、跨境的基础设施供应链、跨境的人才供应链、跨境的公共服务供应链,积极推动中国经济整体升级。

第四大战略重点是以促进世界经贸大融合为重点的跨区域互联互通战略。

更坚决了,但笔者觉得,仅凭国家一纸红头文件,要想实现预期目的,显然有点想当然。

说到底,“小金库”之所以久治不愈,是因为这部分钱属于政府预算外资金,游离于人大以及公众监督视线之外,这不但助长了乱收费、乱摊派和乱罚款等不良风气,成为权力寻租的温床,而且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

倘若由政府任意支配“小金库”,不出现问题也难。所以,笔者觉得,就目前而言,最紧迫的就是要实现财政预算变革。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实行全口径预算管理,完善公共财政预算。这就要求,用“大预算”来医治“小金库”,具体点讲,一方面,对预算外的收入进行一次彻底清理,对不尽合理的收费,该合并的合并,该取消的一律取缔;与此同时,新《预算法》里必须写入“所有的政府收入和支出都应当全部纳入预算”,从而建立新型的公共财政,确立“大收入、大支出”的财政分配利益格局,惟此,才能让“小金库”顺利搬到“预算内”的“大家庭”,接受人大、公众和社会的监督。

当然,在没有修改《预算法》之前,深化资金管理制度,架构长效治理机制,也值得探讨。譬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刘锡荣在审议刑法修正案(七)草案时提出了集体腐败的概念,并表示可考虑首先把私立小金库列入刑法犯罪中。可以预见的是,从法律的视角来遏制“小金库”,要比中央纪委出台的文件以及其他规定的威慑力要大得多。

用“大预算”医治“小金库”

吴睿鹤

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和审计署上月联合发文,决定从8月至10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贯彻执行中央八项新规定严肃财经纪律和“小金库”专项治理工作。此次专项治理的范围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各人民团体,重点是纳入预算管理或有财政拨款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

“小金库”虽然姓“小”,但容量并不小。据业内专家估算,随着财政收入的日益增长,我国每年发生的“小金库”资金总额或在1000亿元以上。而对于“小金库”医治并不是今年首次开展,据统计,30年间经历13次清理整顿,国务院就小金库曾经发出过11次清查文件,各地更是下发过不少相关文件,可是“小金库”不但没有根除,在一些地方和单位还愈演愈烈,犹如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一茬。

从昔日转移支付、套取专项资金的“小儿科”手法,演变成违规收费、罚款及摊派的新手法,升级换代之快,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力;从原先打着出租收入的旗号,到“光明正大”地以会议费、劳务费、培训费和咨询费等名义套取资金,再到明目张胆地利用假发票非法票据骗取资金设立“小金库”,几乎将原本暗箱操作的传统模式,带进了明媚的阳光里。

尽管从此次国家出台的公共政策来看,无论从追溯年度上,还是从处罚方式上,比原先清理力度加大了,态度

通战略。

中国经济过去主要依靠“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这三个点支撑,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中国正在形成新的战略支点,进入了多点支撑的时代。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将立足于贯通域外、沿海、沿江、沿边与内陆互联互通的大通道。

近些年来,全球新一轮基建投资大潮,对通信、港口、交通等基础设施需求非常庞大。根据《国际商业监测》发报告预测,随着各国政府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到2030年,全球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将达57万亿美元,其中在57万亿美元投资需求中,水和污水处理、能源及交通建设约占80%,成为国际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最主要领域。

当前,中国凭借在公路、高铁、桥梁等领域较强的基础设施能力已超过美国和欧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基础设施投资国。数据显示,自1992年到2012年,中国将大约8.5%的GDP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远远超过美国和欧盟的2.6%的平均水平。中国应该以打造“一带一路”战略综合枢纽城市为契机,以公路、铁路、海路(港口)、空路(航运)等为重点,使亚洲基础设施朝着更加联通、更加兼容、更加智能、更加高端、更加便利的方向发展,打造综合枢纽,促进亚洲“大联通”。与此同时,加快中国高铁与“中国装备”走出去,在海外设立零部件和研发基地,也将通过价值链重构带动周边国家经济发展,有望形成“雁阵模式”。

(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

焦点评论

沪港通进入测试阶段



市场热盼沪港通,技术测试进行中。两地制度在磨合,AH股价或趋同。专业机构忙布局,普通散户紧跟从。资本市场渐开放,科学监管不放松。

赵乃育/漫画
孙勇/诗

一线城市取消楼市限购可能性不大

李宇嘉

近期,关于一线城市取消楼市限购的传闻有很多,如北京或将144平方米以上住房购置不再执行限购政策,广州的增城、从化和南沙三个区域退出限购,深圳将于10月1日取消限购等等。布局于46个主要城市,执行3年之久、被称为调控器器的住房限购体系,其瓦解速度之快超出预期;被誉为楼市“优等生”的一线城市,也并非看上去那样美,上半年成交量领跌全国,平均库存消化周期突破12个月的警戒线;在近期召开的全国住房城乡建设工作会议上,“千方百计消化库存”成为下半年楼市政策的主题。从上述三个方面推测,一线城市退出限购的传闻也并非空穴来风。那么,一线城市能否坚守住限购的最后版图?这不仅是老百姓和行业最为关心的问题,也是各界对于地方政府救市行动未来演化的最大猜测。

笔者认为,一线城市退出楼市限购的可能性非常小。

首先,要客观评估一线城市楼市目前所处的状态,即是否已经“差”到了需要退出限购的程度。今年上半年,尽管一线城市楼市成交量下滑30%至50%,但是,一方面,如此大幅度的下滑与2013年同期高基数有关。2013年3月份发布的国办发[2013]17号文,要求热点城市实施“20%的房贷交易个人所得税”政策,尽管这一重磅紧缩性政策最后落空,但造成了赶政策“末班车”的羊群效应,导致需求过度超前释放,这是推高一线城市2013年上半年楼市成交量导致2014年需求不足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2012年以后,主流开发商纷纷回归一线城市,一线城市的总体地价水平进入新一轮快速上涨周期。2013年上半年,一线城市土地溢价率普遍在30%至40%,远高于全国300个城市同期平均17%的溢价水平。2013年,全国共诞生了67个地王,其中70%的地王来自于一线城市。总体地价水平的上涨直接刺激房价上涨,一线城市房价(选取代表性更强的二手住房价格)在2013年上半年就上涨了15%左右。但是,去年上半年国家并未出台实质性紧缩的政策,2010年限购以来积压的住房需求开始释放,一线城市楼市预期开始好转,这是造成一线城市成交量非正常增长的另一个原因。

2013年上半年,一线城市楼市成交量增幅在25%至50%之间,是2009年以来的最高增速水平。因此,2014年上半年,一线城市楼市成交量之所以明显下滑,除了房贷收紧、楼市新一轮快速上涨后正常回调外,基数效应占了很大成分。更为重要的是,若与今年上半年一线城市楼市平均成交量甚至还上涨了15%左右。也就是说,今年上半年一线城市楼市成交量仍处在高位;再看价格水平,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一线城市房价集体出现环比下跌是从6月份开始的,但同比2013年6月仍有7%左右的价格上涨。因此,不管从成交量看,还是从价格水平看,一线城市楼市仍处于在近年来的相对高位。对于楼市形势的如上客观判断,决定了一线城市不可能盲目退出限购政策。

其次,一线城市今年以来的

下滑属于周期性和供应结构性重叠的下滑,而非趋势性和行业衰退性下滑,要站在长期供求关系的高度来看待坚守限购的意义。今年以来,一线城市也出现了类似于二三线城市库存攀升、房价下跌、需求不足等共性。但是,一线城市实际管理总人口在1亿左右,占据全国城镇人口的1/6,而且未来还将处于年均150万以上的人口净流入状态。目前,尽管全国城镇人均住房套数在1-1.14套,但住房资源占有极不均衡,85%的家庭户均0.75套住房,住房资源占有不均衡在一线城市最为严重,人均住房在0.75至0.5套之间,有效需求和潜在需求规模较大,长期内的供求关系依旧比较紧张。

目前,一线城市楼市成交量之所以在今年上半年下滑,一方面是因为房价在最近几年过快上涨、过度繁荣、过度投机,而85%的人群住房支付能力严重不足(房价收入比在15倍左右),造成需求乏力,甚至断档,只有通过楼市周期性的调整才能重新匹配供求关系;另一方面,一线城市新房供应存在价格虚高、位置偏远、配套太差的问题,不适宜目前占市场主体的刚需人群的需求,楼市下滑有结构性影响的成分。想想,北京、上海和深圳新房供应都在城市边缘,甚至是行政边界带,但房价水平都在2万/平方米以上,而配套却难言齐备,对刚需来说,性价比很差。

限购取消后,需求会突然增加,这在其他近期放松限购的城市已被证实。因此,如果一线城市放开限购,受政策打压前期积累的需求会释放,特别是改善性需求和投资需求,以及受政策预期影响的首次购房需求。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一线城市住房消费的梯次特性(先租房后买房、先买小房后买大房)更明显,各类需求释放也更突出。因此,限购放松后,一线城市房价上涨幅度和持续时间远大于其他城市。结果是,不仅比无房产和中低收入人群住房问题无法通过难得的周期性调整机会而得到解决,而且供应结构性问题也无法通过调整而暴露和解决,一线城市楼市回升将是畸形的、不可持续的,也可能会重蹈二三线城市正在面临的楼市泡沫问题。

最后,一线城市是我国楼市的“风向标”,向来引领全国楼市发展,要站在推进新型城镇化、户籍制度改革的高度来看待楼市下调的积极意义。由于资金、人口和资源高度集聚,一线城市成交量、房价涨跌幅度一般也大于其他城市,这不值得过多渲染,因为但凡国际大都市,楼市波动幅度都很大。但值得注意的是,包括一线城市在内的全国50个大型城市,集中了2.6亿外来人口的80%,将这部分群体的住房需求释放出来,将是消化这些城市库存的中坚力量,也是促进这些城市楼市未来发展的中坚力量,更是促进户籍制度改革、外来人口城市化的基础。即便一线城市继续执行限购政策,从长期来看,其楼市量价下跌的幅度也有限。但是,其下跌后将会释放出大量住房需求,特别是外来非户籍人群和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需求,这将是长期内稳定全国其他城市楼市、推动新型城镇化布局的榜样。

(作者单位:深圳市房地产研究中心)

资产管理业应回归资产管理本质

项峰

近日,中诚信托再爆兑付风险事件,“诚至令开2号计划”无法按照约定日期兑付。当前我国包括信托计划在内的资产管理业务兑付风险频发发生,这虽然有实体经济周期波动因素影响,但资产管理业运营不透明、不规范也是重要原因所在。考虑到我国资产管理业务主要以跨市场交易、交叉性运作为主要特征,在实体经济运行风险加快向金融领域传导的背景下,强调资产管理业向资产管理本质回归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我国资产管理业已具相当规模。据《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4)》公布的数据,截至2013年末,我国67家信托公司管理的信托计划规模达10.9万亿元,银行业理财产品余额9.5万亿元,证券公司资产管理业务受托资金规模达5.2万亿元,基金管理公司已设立的62家

子公司资产管理规模达9414亿元。在业务规模快速扩张同时,我国资产管理业务运作不透明、刚性兑付、风险不隔离等问题也较为突出,明显偏离了资产管理“受人之托、代客理财”的本质要求,存在较大的潜在与真实金融风险。

一是业务运作不透明。资产管理业务属信托行为,在授权范围内金融机构代客管理与运作资金,并将有关信息及时、清晰、无误地传递给客户,是其法定义务。以我国商业银行理财业务为例,其运作不透明,既没有在资金募集期明确具体投资范围,也没有在随后产品存续期内进行任何信息披露。虽然监管当局要求商业银行为每只理财产品单独核算,但商业银行在理财资金来源上采取了“资金池”管理,在理财资金运用上采取了“资产池”运作,使得理财产品与对应资产并不唯一,而理财产品相关财务报表也未从定期、不定期公开披露,投资者无从了解相关业务运作收益

及潜在风险。

二是刚性兑付潜规则。刚性兑付是我国资产管理业得以迅速普及和规模急剧扩张的主要支撑。在实务中,商业银行理财业务存款化,而相当规模的信托公司信托计划、证券公司资产管理业务、基金子公司资产管理业务与理财业务相对接,成为商业银行提供表外融资的主要通道,使得刚性兑付成为商业银行理财业务之外其他类型资产管理业务的“抽屉担保”。由于资产管理业务运作不透明,信息披露不充分,销售也存在误导,完全要求投资者承担资产管理业务项下的风险,理由似不充分。

三是风险不隔离。风险隔离是资产管理业务内部,以及资产管理与金融机构自营业务之间风险管理的最基本要求。但在实务中,资产管理业务与金融机构自营业务存在利益输送的可能性较大,甚至还存在侵害投资者利

益的行为。与国外资产管理主要投向标准化金融工具不同,我国资产管理业务还承担了相当规模社会融资的功能,更易遭受实体经济信用风险冲击。而资产管理业务又是典型的跨市场交叉性金融工具,具备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传导特征,一定程度增加了金融市场运作的非稳定性。

加强资产管理业务监管已经成为监管当局的重要议题。2014年5月19日,美国财政部下属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是否应当对资产管理类金融机构进行更加严格的监管,以及如何监管。近期,中国银监会对银行理财业务组织管理体系进行规范,将有助于商业银行理财回归资产管理本质。未来,在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加强金融市场“大资管”监管,统一监管标准,防止监管套利,明确资产管理本质属性,将是资产管理业务规范管理的必由之路。

联系我们

本版文章如无特别说明,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也不代表作者供职机构的观点。如果您想发表评论,请打电话给0755-83501640;发电邮至ppll18@126.com。